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half, several tall, jagged mountain peaks are depicted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some hatching to suggest texture and depth. Below the mountains, a body of water is shown with simple, wavy lines. A single sailboat with a single mast and a rectangular sail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water.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elegant,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design.

學林漫叢

六 集

Z429/
2-3

学 林 漫 录
六 集

中 华 书 局

1982年·北京

7k20/06
封面题签 黄苗子

封面设计 王增寅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张忱石 傅璇琮 许逸民

学 林 漫 录

六 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⁵/₈印张·2插页·179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300册

统一书号: 17018·116 定价: 0.90元

目 录

记童书业先生	黄永年 (1)
试谈宋云彬先生的学术工作	吴甲丰 (18)
师友怀想录	吴小如 (30)
丰子恺轶事四则	江 东 (37)
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	钱伯城 (39)
建文逊国问题的旧案重提	牟小东 (74)
记赵之谦	黄苗子 (83)
漫谈秋瑾二三事	陈汝衡 (90)
屈原在汨罗的遗迹	周寅宾 (94)
《史记》“蒲将军”钩沉	王岳尘 (102)
唐代已出现“关公显圣”的传说	官桂铨 (106)
《登科记考》纠缪	卞孝萱 (110)
唐人的早行诗和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周本淳 (114)
诗林证误漫录	吴企明 (120)
“乌纱帽”小考	
——从李白一首诗谈起	薛天纬 (131)
“掇蓝”和“揉蓝”	林 薇 (135)
顾炎武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孙钦善 (137)

孙诒让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贡献	杜通松 (148)
中国古代妇女面饰琐谈	杨如鹏 (155)
“幽闭”考略	楼肇明 (162)
扬州琼花考辨	李廷先 (165)
漫谈《京瓦伎艺》	孔宪易 (171)
广和居题壁诗	邓云乡 (180)
京华琐话	刘叶秋 (185)
关于董小宛的结局	顾启 姜光斗 (191)
书林胜语	李致忠 (197)
萍斋书画札	李铁匠 (215)
陈见智和《一线天》传奇	刘世德 (225)
谈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	谢刚主 (233)

记童书业先生

黄 永 年

我国现代知名的史学家童书业先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因患肺气肿引起心脏移位逝世，至今已有十三年了。近来学术机构和刊物编辑部分纷纷组织撰写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传记，我作为童先生生前最喜爱的学生，同时又是他的长婿，对撰写他的传记自是义不容辞。去年就应《晋阳学刊》编辑部之约写了六、七千字的《童书业传略》，但事后重读编辑寄来的打印稿，总还感觉到不十分满意。这倒不是说有什么脱略或失实，因为我撰写时曾根据童先生五十岁时自撰的《年谱》和逝世前不久所写的《六十年的回忆》等手稿，这些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都是第一手资料，加之童先生生平的著作包括专书和论文我都读过，因而在评价他的学术成就时也不致有空泛溢美之辞。问题是在这种正规的“传略”总有点“宣付国史馆立传”的味道，限于体例，很难把传主的音容笑貌以及遗闻佚事充分写出来，而真正了解一个学者的精神面貌，遗闻佚事的作用至少不亚于履历表和著作目录，这才使我体会到古人在撰写严肃的碑传外，为什么还要在文集或笔记里留下一些某某名人的“别传”、“外传”、“佚事”之类。正好，中华书局的同志前些日子到西安来开会，要我给《学林漫录》写篇回忆童书业先生的文章，而且讲明可不拘体式，没有任何框框。这正合鄙意，于是欣然应约，趁寒假的空隙动手写这篇《记童书业先生》。当然要写

得生动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记得上一世纪末旧文学大家王闿运对自己某件作品的评价是：执笔时力追《史记》，文成覆视乃似《明史》。我的文学修养远不及王闿运，写出来会不会连《明史》都不如呢？那就只能说才局所限，力不从心，至祈读者原鉴了。

话要从三十九年前说起。当时是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上海租界，原先设在租界不归敌伪管辖的大学、中学都被迫停办，著名的史学家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先生回到他的故乡江苏常州，被设在常州郊区不归敌伪管辖的青云中学聘请去临时任教。我当时是个读高中的青年学生，慕吕先生大名转入“青云”上高二班文科，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又从吕先生口中知道童书业先生的大名。

话是我问起的。原来，我对吕先生的学问是早就很崇拜的，我上初中时自学文史看古书是靠两本入门书，第一本就是吕先生的《经子解题》，第二本才是张之洞、缪荃孙的《书目答问》。但对“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式论著却很少有机会看到，只道听途说地知道有个顾颉刚写了一本《古史辨》，把治水的圣人大禹说成一条虫，这还不够荒唐？所以有天晚上我在吕先生处闲谈，问吕先生“《古史辨》这本书怎样”时，本料想是会得到否定的回答的，谁知吕先生却回答说“此书颇有道理”，并告诉我此书的第七册是吕先生自己和一位童书业先生合编的。以吕先生之尊居然也和人家合编《古史辨》，使我不得不对《古史辨》刮目相看。我在这里并非随便用“刮目相看”这个成语，因为当时真是马上向母亲要了钱，寄往上海，托人到开明书店买了一部《古史辨》第七册来刮目细读。

《古史辨》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已很少知道了，大学历史系毕

业生中读过《古史辨》的恐怕都是凤毛麟角，某些文科院校的图书馆里甚至连当年发行量最大的《古史辨》第一册也缺藏找不到。但这套著作在我国现代史学发展上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至少在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有志研究历史的青年确实起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此以前，三皇五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代以上都是太平郅治的黄金时代，较新式的中学教科书里对此也只加上“传说”两个字，没有把这些古代圣君彻底否定的。而《古史辨》，却理直气壮地把这一大批圣君的老底揭出来，公开指出他们是神而不是人。气壮者，不再吞吞吐吐、弥缝调和之谓；理直者，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大量文献而找出如何由神演化成人的规律。就以相传治水的禹来说吧，顾颉刚先生开始推测为南方神话中的人物，其本相应为爬虫之类，而《古史辨》第七册中顾先生写的《九州之戎与戎禹》，根据更扎实的史料，考证出禹是西方戎族所信仰的社神。说实在话，我本来是有点顽固的，把所谓“黄金时代”的古圣君说成是神，感情上颇通不过，但在精密的考证面前，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低头认输，从此在古史研究和考证方法上成为顾先生的信徒。

《古史辨》第七册既是童书业先生和吕先生合编的，而且其中我爱读的，除顾先生的论文外，《鲧禹的传说》、《夏史三论》也都是童先生和顾先生合著的，另外收入第七册的童先生的论文《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天问徂穷西征解》等也使我读了心悦诚服，加之年轻人总有点崇拜名人的心理，于是渴望一见顾先生和童先生，真有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顾先生当时在大后方，暂时见不到，至于童先生，则从一位在江苏宜兴张渚镇念劬中学读书的旧同学的信中知道他在该校教书。正巧那年寒假他辞职回上海，要路过常州，于是得到了见面的机会。

见面是在另一位念劬中学的学生常州人蒋克钧家里。在座的

还有一位是比我大几岁的承名世，常州三河口人，自学成名的山水画家。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名世兄和童先生谈得比较多些，因为童先生也是山水画的能手，而且都喜欢明代沈石田，唐六如一路。记得这次他们合作画了好几幅，其中有一幅就是仿沈石田的“庐山高”。我虽爱看画，但不会作画，在古史上也正处在准备入门的阶段，提不出什么新问题、新见解向童先生请教。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这位史学家的不修边幅。他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得多，当时只有三十四岁，但头发之乱、衣服之烂且脏实在使我感到惊奇。后来才知道，这主要还不是抗战期间生活穷困所致，而是因为把全副心力用在学问上，无暇顾及穿衣、理发这类题外之事。

二

第一次见面在学问上虽没有新收获，但是却在吕先生之外又得到了一位可以真正在学问上指导自己的老师。我当时并未听过童先生的课，更不曾行过旧式的叩头拜师礼，而只是在此后写信给童先生时称“丕绳吾师”，蒙他不弃而建立了师生关系。丕绳是童先生的字，过去的习惯，朋友之间也不能直呼其名而必须称字，何况称老师了。现在不讲这一套了，知道童先生字丕绳的人已不多了，所以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只好从俗称童书业先生，谅读者不会指责我不恭吧。

童先生辞职离开念劬中学后在常州横林镇的惠林中学教书，这也是一所实际上不归敌伪管辖的中学。除通信外，每逢假期他进常州城时常在我家吃饭，谈话的机会较多，对他之所以能在史学上取得成就逐渐有了一些了解。原来这位已在光华大学历史系当过讲师的学者竟连正规中学都没有上过，除了小时候读过几年古书外，完全是凭自学。

童家是浙江宁波的“世家大族”，童先生的祖父中过进士，点过

翰林,以后又捐了道员在安徽、山东两省做过劝业道,署过臬台,辛亥革命后做了几年遗老才去世。童先生是这位遗老的长孙,因此从小受的就是封建旧式教育,从七岁到十五岁,遍读了《五经》、《四书》外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尔雅》、《老子》、《孙子》等古书。他的父亲在上海当会计师,叫他在会计师事务所里当练习生,又叫他进圣枋济英文专修学校读了一年半英语,要他继承父业,他不愿意。二十一岁结婚后,到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当小职员,读到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郭沫若、顾颉刚等人的著作,特别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感到兴趣,从此正式走上了研究古史的道路。

青年人要在学问上成材,除自己勤奋外,总少不了老前辈的识拔。童先生之受顾颉刚先生的识拔培养,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当时是一九三四年,童先生二十七岁,由于不为父亲所喜爱,经人家介绍只身到杭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当了一名起码的校对员,边工作边读书边写文章。图书馆的主管者也不以资格限人,让这个毫无资历的青年人的文章在颇有声誉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不断刊登(附带说一下,刊登时也从不按作者的地位、名望排次序,我后来翻阅过这个刊物,童先生的文章时常排在第一篇,当时的学术性刊物往往如此)。在此以前,童先生已把他所写的《虞书疏证》稿本寄给顾先生请教,这时顾先生又从《馆刊》上看到童先生的《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等文章,确认这是一个大可造就的人材,这年秋天,因母丧回杭州之便,和童先生见面,约他到北京协助自己做研究工作。

当时顾先生已是研究古史的权威人士,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并兼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的主任,还在张国淦等老先生协助下创办了研究历史地理的民间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童先生在第二年夏天到北京后,顾先生安排他在家吃饭住宿,让

他整天读书写文章，做自己研究工作的助手。以后又让他担任禹贡学会的编辑和顾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春秋史的助教。不过这个助教是没有列入学校编制的，因为童先生连中学毕业证书都拿不出来。因此童先生的工资是由顾先生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拿出几十元来给他。当时大米卖五、六元钱一担，几十元已是不太小的数字，足以使童先生专心致志于学问，不会有后顾之忧。

在北京的几年可说是童先生在学问上获得成熟的黄金时代。顾先生藏书之多一向是有名的，研究古史用的线装书以及时人论著、杂志无不应有尽有，禹贡学会的藏书也颇具规模。顾先生门下在禹贡学会做研究工作的青年人也是才智之士，现在健在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史学界、地理学界的专家权威，当年童先生和他们在一起所得切磋之乐可想而知。童先生也确实不负顾先生的期望，废寝忘食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收入《古史辨》第七册的重要论文，以及包括和顾先生共同署名的论文，都是这个时期撰写的，《古史辨》第七册的编纂，也是这个时期在顾先生的指导下着手的，此外还给禹贡学会的《禹贡》半月刊编了一册《古代地理专号》，担任顾先生春秋史课的助教时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春秋史》讲义，抗战胜利后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现代研究春秋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据说顾先生还想送童先生去日本留学，由于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实现。童先生离北京回南方，经吕思勉先生推荐在光华大学当讲师，并把《古史辨》第七册编成出版。日军进占租界后离上海，先后到念劬、惠林两中学教书。

童先生的这段经历使我很受鼓舞，使我知道学问此道，特别是文科的历史、古典文学之类，是完全可以自学而获得成就的，当然最好要取得前辈学者的指导。

三

我遇到童先生时他虽然年龄还不到四十，但由于他在学问上的成熟，很自然地考虑到在青年中找寻可以培养的新生力量，就象当年顾先生识拔培养他那样。大概是看到我还肯读书，在学问上有点上进心吧，于是就把我选作他的培养对象。记得我读《通鉴纪事本末》，就出于他的指引。我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春秋左氏传成书考索》（当然只是一篇幼稚的考索）寄给他，他回信说“文章颇有见地，惟证据尚嫌不足”，以资鼓励。

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习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这时期他对我讲得很多，除古史传说外，凡是研究过的问题，如墨子的姓氏身份，李自成的牺牲时地，谁是花卉画中没骨花卉的创始人，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是否可信，都先后对我讲过。关于后两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齐鲁学报》的第一、二期上，太平洋战争前由开明书店出版，我很快就买到手。没骨花问题因为我读过《梦溪笔谈》，知道创始者是徐熙的后人徐崇嗣而不是徐熙本人，因此童先生的考证还不使我惊奇。使我惊奇的是童先生对山水画南北分宗说的否定，这完全粉碎了我原先的山水画史概念，对我思想震动之大，不亚于读《古史辨》。

我小时候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所谓山水画在唐代分南北宗，北宗创于李思训，着色工细；南宗创于王维，水墨渲染，二人冠绝百代，而王为文人画之祖，是正宗的正宗之类的概念，我认为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可是童先生的文章一上来就指出这所谓常识其实只是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等人编造的伪画史，其目的在于提高他们松江派山水画的地位，排斥浙派院画家戴进、吴伟。童先生认为山水画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发展的。唐以前的山水画还处在幼

稚阶段。唐代吴道子、李思训对山水画的成立各有贡献，而王维的地位不及吴、李，当时并无南北宗对峙之说。五代、北宋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郭熙等在唐人基础上继续发展，他们多画北方山水，可称之为北方画派。江南派的山水，可能起源于南唐的董源、巨然，经南北宋之间米芾父子有所发展。南宋院画家李唐、马远、夏珪的画风是南北两派的混合。以后发展为南派成分更多的元赵孟頫和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大家。到明代浙派近马、夏，吴门派尤其是松江派则源出元四家而更江南化。这就是童先生探索出来的山水画真史。童先生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在此以前还写过一篇简短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发表在抗战前的《考古》社刊第四期上。另外在抗战初还写了一本《中古绘画史》，五十年代加了新序改名为《唐宋绘画谈丛》出版。这几种论著在细节上容有出入详略，但总的论纲则始终一贯。我认为，我国之有比较科学的绘画史应该说开创于童先生，这大概不能算是私阿所好之言吧。

童先生之所以能够写出比较科学的画史，主要原因是他掌握了正确的研究方法，即尽量依据原始的资料而不盲从晚出的东西，如研究唐代画史时根据中唐时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研究晚唐、五代、北宋画史时根据北宋时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而不为明清人的言论以及不可靠的名迹所迷惑。这种方法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和童先生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它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尽管当时童先生以及顾先生都还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在不轻信所谓传世名迹这一点上，我记得自己曾找过一套故宫名画明信片向童先生请教，童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象巨然《秋山图》之类都是明朝人的伪作，画是画得很好，是松江派的杰作，可是早在五代的巨然怎么能画得出来呢？据说，以鉴别古代绘画出名的徐邦达先生对童先生的许多看法都很同意。而童

先生否定董其昌等人编造的伪画史也很得老画家俞剑华先生以及启功先生等的支持，因为这几位先生也同样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总会得到多数人承认的，君不见有些人口头上骂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实际上却在大量用顾先生的研究成果吗！

童先生在研究画史上取得成就的另一个因素是他自己也会画。前面说过，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看到他和承名世兄合作画《庐山高》。他十多岁时就在上海跟随一些画家学画，以后又经北京的胡佩衡先生函授绘画，在禹贡学会时还业余进京华美专学习，拿到了毕业证书（后来童先生对我开玩笑说：这张毕业证书就是我的最高学历）。所以他深明绘画的技法，能从技法上找寻古代画家的师承渊源、发展规律。不过他认为自己天性并不近于艺术，字写不好，画上题字往往要请人代笔，画也工力有余，天趣不足，这一点我也同意。我手边还留有他一幅仿明人的小山水，挂在卧室里，朋友们看了都说好，有位搞艺术的还建议发表，但我认为这究竟只是“能品”，不算“神品”。童先生毕竟是一位史学家而不是艺术家，不过不仅是古史研究专家而且还是艺术史专家而已。

四

抗战胜利，童先生到上海市博物馆担任历史部主任，我进复旦大学读历史，一直到解放，这几年是我和童先生过从最多的几年。

当时国民党打内战，文教经费少得可怜。博物馆办不起刊物，只在上海的《中央日报》上争到一小块版面出个《文物周刊》，童先生则是《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他这时主要的研究课题是瓷器史。我国的瓷器是世界闻名的，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明清名窑，但多年来不曾有过一部象样的瓷器史，有的只是骨董家和古玩商人的郢书燕说，附会之谈。因此童先生决心从头做起，对历史上的名窑的

真面目逐个加以考证，整理出一部科学的中国瓷器史来。所用的方法和研究绘画史完全相同，即不信骨董家和古玩商人的话，而从宋以来的笔记、小说、诗文集里认真发掘关于瓷器的原始文献，来确定其色彩特征，找寻出其中的发展规律。对唐代的越窑，宋代的青瓷，唐、宋时代的白瓷，明代的青光瓷、彩瓷，清代的官窑等等，都写出了文章，先后发表在《文物周刊》上，还综合研究成果写了一篇《中国瓷器史概论》，五十年代经修改补充后出版了一册《中国瓷器史论丛》。这是童先生在美术史上除绘画史外的又一大贡献。此外，童先生在这个时期还写青铜器、石鼓、古史、古地理方面的文章，以及古人服饰、家具、用器等方面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文物周刊》和其他报纸的文史性质的副刊上。我记得在《文物周刊》上发表过与唐兰先生讨论石鼓时代的文章，往复辩论好多次。唐先生是素负盛名的专家，但在这次争辩中似乎没有占上风。

我当时在复旦的功课并不轻，一学期得读六、七门课，比现在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课重得多，但空余时间还是可以大量挤出来，可以读时人论著和古书，可以写文章。复旦在江湾，离北四川路横浜桥的博物馆不算太远，有时还可搭校车，因此差不多每个星期、至多半个月总要去博物馆看童先生。童先生喜欢和人合写文章，由他口述主要史料和见解，别人听了再查对史料写成文章，他自己不署名，稿费也归别人。我当时也在他这样指导下写过《鲁隐公时代的鲁国外交》等古史论文，但更多的是我自己研究写作，由他介绍推荐给《文物周刊》和魏建猷先生主编的《东南日报》的《文史》等副刊上发表。这些文章今天看来当然不够成熟，不过多少还有点新东西，如明器中有一种怪兽，罗振玉释为“魃头”，我根据《唐会要》、《太平广记》等文献，认为“魃头”和“方相”是同一类东西，并非殉葬品，殉葬的怪兽状明器应是“当户”、“当野”、“祖明”、“祖思”之类，博物馆为此更换了原来的“魃头”说明牌。

当时顾颉刚先生已从大后方回来，有时住在苏州顾家花园老宅，有时住在上海，童先生带我去拜见了，蒙他老先生也认我为学生。他这时计划要编写一部三、四十万字的中国通史，把任务交给了童先生，童先生口述大纲，由我执笔。我记得写到了两汉，临解放前中缀。

童先生到复旦兼过课，是谭季龙（其骧）先生的“中国沿革地理”课，谭先生在浙江大学不能来，请童先生代讲，我在这时才第一次正式听童先生讲课。童先生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据他告诉我，小时候读过的古书除《公羊》、《谷梁》、《周礼》、《孝经》等只是点阅外，其余读过的都能背得出来。后来我听禹贡学会时代和他一起的先生讲，他不仅连最难读的《书经》也可以背诵如流，甚至有人问他什么词在什么古书中出现过几次，他都可以当场回答，不必翻书。因此沿革地理要讲的秦三十六郡、汉十三州部之类，更是如数家珍，不在话下，从未见他带什么备课讲稿来上课。而且据他说，上课时讲着讲着往往还会想出新的见解来。我的记忆力比童先生差远了，现在给研究生讲唐史专业课时还离不了讲稿，不过在讲课中会产生新见解这点我倒也有体会，谁说讲课都是为人，对自己全无提高呢！

童先生在复旦只讲了半年，把沿革地理课讲完，第二学期学校给他送聘书，上写讲师，他一生气没有接受。但为了生活，以后兼任了光华大学和无锡国专沪校的教授。当时童先生单身住博物馆，师母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苏州顾先生老宅，博物馆的薪金要全部寄苏州作家用，自己靠稿费以及兼课的一点钱维持生活。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过得极艰苦，加上素来不注意衣着，一年四季老是穿双半破的黑色胶底鞋，实在寒酸不堪。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

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

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加上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把我当亲儿子看待。

五

解放后童先生应禹贡学会时老友杨拱辰(向奎)先生之邀，携家北上，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我从复旦出来后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教政治课，以后又迁校来西安。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前后十七年中，他只在五二年寒假到上海来看过我们一次，以后我也只趁寒暑假去看过他四次。他在山东大学的情况，山东大学的同志应该知道得比我多，我在这里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和看到的给读者讲一些。

在五十年代前期他担任了好几年历史系副主任职务，充当系主任杨拱辰先生的副手，负责全系教学科研的领导组织工作，这是够辛苦的。当时，教学要强调贯彻马列主义，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又提出向苏联学习，需要开设很多新课程，有些课程名称虽与解放前相同，内容也要调整充实，而需要的参考资料又极其缺乏，更无后来那么多的现成教材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课程没有人讲或没有人肯讲是很自然的，但课又不能不开，于是作为副系主任的童先生自己担当起来。好在他在解放前二、三年已偷偷地读了好些马